



杜甫詩選

新譯

三民書局印行

古文新注今譯叢書
類學文

法譯

張其成
著

才高
雄

PDG

張忠綱
趙睿才
綦維
注譯

新 譯

杜 甫 詩 選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杜甫詩選 / 張忠綱, 趙睿才, 綦維注譯. — 初版一
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9

面; 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5028-5 (平裝)

851.4415

97017682

◎ 新譯杜甫詩選

注譯者 張忠綱 趙睿才 綦維

責任編輯 吳仁昌

美術設計 陳宛琳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9年2月

編號 S 0322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028-5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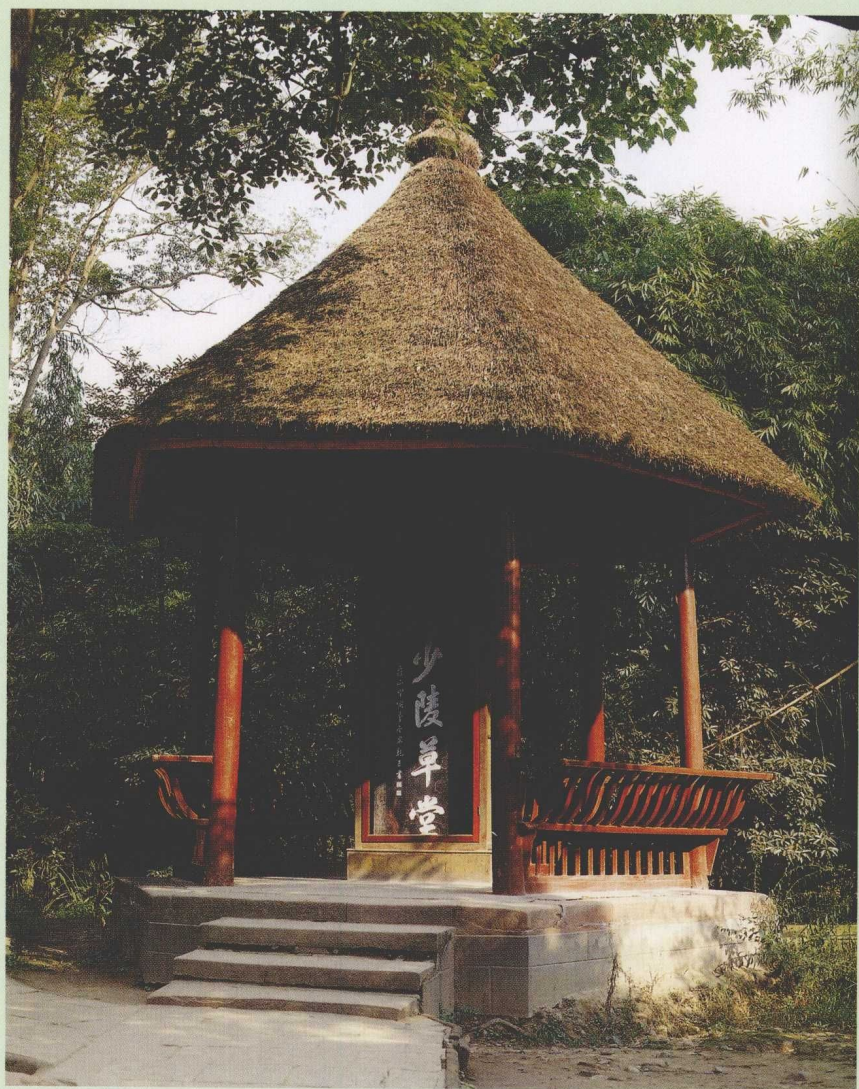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杜甫像



杜甫草堂南大門（陳達鎮攝）



杜甫草堂內的「少陵草堂」碑亭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劉振強

人類歷史發展，每至偏執一端，往而不返的關頭，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溫故知新，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古典之所以重要，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並不是迷信傳統，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要擴大心量，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局自草創以來，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幫助有心的讀者，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我們工作的原則是「兼取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鑄眾說，擇善而從；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頗受各界的喜愛，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也有信心繼續推

廣這項工作。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注譯的成員，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陣容的充實，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兼採經、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

古籍的注譯，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讓我們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

導 讀

一、杜甫家世與生平

杜甫（西元七一—七七〇年），字子美，自稱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世稱「杜少陵」。郡望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生於鞏縣（今河南鞏義）瑤灣村。十三世祖杜預，是晉代名將、著名學者，人號「杜武庫」，自稱有「《左傳》癖」，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封為當陽縣侯。曾祖杜依藝，為鞏縣令，遂遷居鞏縣。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今屬山東）司馬、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杜甫外祖父的母親，是唐高祖李淵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兒。外祖母的父親李琮，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孫，即太宗第十子紀王李慎的次子，被封為義陽王。杜甫的母親崔氏是清河東武城（今屬山東）人，她在杜甫的幼年就去世了。父親杜閑續娶了盧氏，為杜甫的繼母。但是杜甫並沒有從盧氏身上得到多少母愛，反倒是他二姑承擔了母親的角色，把小杜甫撫育成。杜甫的夫人楊氏，弘農（今河南靈寶）人，為司農少卿楊怡女。有子二人：宗文、宗武。

杜甫早慧，七歲即能作詩，九歲能書大字，他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可見杜甫是個早熟的孩子。杜甫幼年很是頑皮，他在晚年回憶自己孩提時說：「憶

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百憂集行》）這個早熟孩子超強的記憶力和出眾的文學才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四、五歲時，杜甫即與文壇名士交往，受到他們的稱許。《壯遊》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崔，即時任鄭州刺史的崔尚；魏，即豫州刺史魏啟心。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他又說：「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李邕是當時的名士、大書法家，王翰是著名的詩人。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春，流寓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杜甫寫下了《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詩中提到的岐王和崔九，即唐玄宗之弟李範和玄宗寵臣、殿中監崔滌，二人都卒於開元十四年（西元七二六年），而當時杜甫才十五歲，這個充滿自信的少年已經出入王侯第宅與宴酬唱、嶄露頭角了。可見詩人的確是個早熟的天才。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遊。十九歲時，他出遊郇瑕（今山西臨猗）。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其父杜閑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開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陽，築室首陽山下。約在此時，與楊氏結婚。天寶三載（西元七四四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的深厚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壯遊》）的齊趙之遊。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作梗，玩弄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使得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奔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但都無結果。天寶十載正月，玄宗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

大盛典，杜甫乃於九載冬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集賢院，等候分配，然僅得「參列選序」資格，未實授官。直到十四載，才得授一個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淒涼折腰」的官職，旋改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就在這個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聞肅宗即位，即於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詩人目睹國家的殘破以及叛軍的殘暴，感時傷事，寫下了〈春望〉、〈哀江頭〉、〈哀王孫〉等不朽詩篇。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年）四月，杜甫冒險逃出長安奔赴鳳翔行在。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鎰救免，但從此受到肅宗的疏遠。閏八月，墨制敕放鄜州省家，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年）六月，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從此永遠離開朝廷。

乾元元年冬，杜甫由華州赴洛陽，二年春，返回華州，正值唐軍九節度使鄴城戰役潰敗，大肆抓丁以補充軍力，杜甫就沿途所見所感，寫成著名的組詩「三吏」、「三別」。七月，杜甫棄官去秦州（今甘肅天水），開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間」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備嘗艱辛，一度瀕臨絕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攜家離開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肅成縣），想解決衣食之憂。不料到同谷後，生活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飢寒交迫的絕境之中。杜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中，用字字血淚記錄下這段最為艱苦的歲月。十二月初，杜甫於無奈之下再次逃難，攜家離開同谷入蜀，於年底抵達成都。因為這一年之內奔波流離，不斷逃難，杜甫稱之為「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年）春，杜甫一家在親友們的幫助下，卜居於西郊草堂。二年歲末，杜甫的好友嚴武任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給予杜甫一家不少照顧。代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年）七月，嚴武奉召入朝，杜甫送至綿州（今四川綿陽）。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臺）、閬州（今四川

閬中)一帶。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正月，嚴武再鎮成都，幾次寫信希望杜甫回來。杜甫於是放棄原來打算出峽東遊的計畫，又攜家回到成都。六月，嚴武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又稱「杜工部」。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年)正月，杜甫退出幕府。四月，嚴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於五月離開成都乘舟南下，經嘉州(今四川樂山)、戎州(今四川宜賓)、渝州(今重慶)、忠州(今重慶忠縣)至雲安(今重慶雲陽)，次年暮春遷居夔州(今重慶奉節)。杜甫居夔州近兩年，寫詩四百餘首。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年)正月，杜甫攜家出三峽，經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陽。之後，詩人漂泊湖南，貧病交加，瀕臨絕境。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時年五十九歲。直到元和八年(西元八一三年)，杜甫的孫子杜嗣業才「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將暫厝在岳陽的杜甫靈柩運回偃師，葬在首陽山下，緊靠著遠祖杜預、祖父杜審言之墓。就這樣，詩人的遺骨漂泊了四十三年後才又回到生前魂牽夢繞的家鄉。在遷移祖父靈柩路過荊州的時候，杜嗣業遇見大詩人元稹，便請求他給祖父寫一篇墓誌銘，元稹於是寫了〈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盛稱「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二、杜甫的思想

杜甫出身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統教育，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安史之亂」後，他過著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親身經歷了國家深重的苦難，接近了廣大勞苦群眾，他的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繼承者和實踐者。他的闡釋和恢復原始儒家道統的思想，遠在韓愈之前。他繼承和發揚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愛國愛民。杜甫忠君，但並非愚忠，他身歷玄、肅、代三朝，對三代皇帝都有所諷諭和

批評。他的疏救房琯，就充分表明杜甫是直臣，而不是愚忠。杜甫崇高而深摯的愛國主義精神，深沉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於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創作中。而他最可寶貴的，就是身處逆境，卻情繫國家，心想人民，一顆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從沒有停止跳動。「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他始終是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杜甫有著一顆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襟。杜甫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經常能夠從個人的痛苦之中擺脫出來，將關切的目光落到廣大人民群眾身上。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杜甫回家見到自己的「幼子餓已卒」，在極度悲痛中，他還是把目光投向廣大的窮苦人民和遠戍的戰士：「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當草堂的茅屋在風雨飄搖之中「牀頭屋露無乾處」時，他還能想到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窮人們，大聲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是實踐孟子「惻隱之心為仁」的典型。他在〈過津口〉詩中明確地指出：「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艱難困苦、顛沛流離的坎坷生活經歷，加之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使杜甫深深懂得「邦以民為本」的道理。因此，他對飽嘗戰亂之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廣大人民抱著深切的同情。對人民的苦難，他可謂是無事不憂，無時不憂。征夫戍卒，田婦野老，寡妻弱子，漁民樵夫，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命運，無不牽動著詩人的心。在杜甫看來，造成廣大人民苦難的，除了戰亂的原因之外，就是統治者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強取豪奪。而對人民的殘酷壓榨和剝削，完全是為了滿足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面對如此不合理的現實，杜甫挺身而出為民請命：「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杜甫認為，人民的沉重負擔來自統治者的奢侈糜費，因此他要求統治者「行儉德」，節欲戒奢，輕徭薄賦，減輕對人民的盤剝，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文王日儉德，俊乂

始盈庭」，「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崇儉戒奢，是杜甫人生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統治者只有真正做到崇儉戒奢，才能真正減輕人民的負擔，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免蹈「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的覆轍。所以詩人總是懷著滿腔的義憤，無情地鞭撻統治者的奢侈腐化。對那些「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的「豪奪吏」恨之入骨：「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大聲疾呼「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而對廣大窮苦群眾他卻始終充滿同情和尊重。他所交往的，不盡是達官貴人，更多的是小人物，他是以平等的態度和這些小人物來往的，從不擺大詩人的架子。詩人熱愛他們，他們也從來沒有討厭過詩人。他們之間總是友好的。貧苦的勞動婦女在舊社會是地位最低的，被人瞧不起，但杜甫卻對她們寄予深厚的同情。對自己家中的奴僕，杜甫也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關懷他們。他總是盡其所能，樂於助人：「藥許鄰人剮」，「棗熟從人打」，「拾穗許村童」，「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就是對那些小生物，他也充滿惻隱之心：「築場憐穴蟻」，「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鷗臯相怒號」。杜甫這種己飢己溺的仁者胸懷和博愛精神，在他的詩中都有生動的體現。但杜甫不是無原則的和事佬，而是「嫉惡懷剛腸」，他的愛憎是非常鮮明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可以說，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忠恕之道、仁愛精神、惻隱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並身體力行之，他的儒家思想帶有鮮明的實踐性品格。所以後人多認為杜甫是儒者典範，甚至說「老杜似孟子」，往往把杜詩比作儒家經典。清人吳喬說：「詩出於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於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閔損、有若間，出由、求之上。生於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於詩道中復古者也。余嘗置杜詩於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孟衣冠而已。」甚至主張：「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於孔、孟之道有益。」（《圍爐詩話》卷四）

當然，在唐代以儒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統治格局中，在顛沛流離的艱難歲月裡，杜甫也受到佛道思想的一些影響，但那是次要的。前人說「少陵不學仙，而自有仙氣」，「少陵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劉鳳誥《杜工部詩話》卷一），大致是不錯的。

三、杜甫的文學成就

杜甫作品流傳下來的，有詩一千四百五十多首，文、賦二十八篇。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他生當李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時期，而這一歷史轉折的界標，就是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爆發的「安史之亂」，他當時四十四歲。這就是說，杜甫一生，有四分之三時間是生活在所謂「開天盛世」，而四分之一時間，即最後十五年，是在戰亂漂泊中度過的。盛世的熏陶和戰亂的體驗形成強烈的反差。而這巨大的反差卻造就了偉大的詩人。杜甫正是用如椽之筆，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廣闊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內容極其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到軍國大事，帝王將相，小到個人瑣事，生活情趣；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個方面，如繪畫、舞蹈、書法、音樂等。一部杜詩，是他自己的一部自傳，也是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忠實記錄，故被譽為「詩史」。他以詩寫時事，如〈洗兵馬〉、〈三絕句〉等；以詩發議論，如〈戲為六絕句〉、〈偶題〉等；以詩寫人物傳記，如〈八哀詩〉等；以詩寫傳奇，如〈義鵲行〉等；以詩寫奏議，如〈塞廬子〉等；以詩寫贈序，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等；以詩寫書劄，如〈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等；以詩寫自傳，如〈壯遊〉、〈遣懷〉等；以詩寫遊記，如〈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漢陂行〉等。至於詠物抒懷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在杜甫手中，詩差不多成了萬能的工具，把詩的表現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由於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深刻的社會體驗和廣闊的觀察視野，「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

師是汝師」，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廣收博取的開明態度，加之「詩是吾家事」的家學傳統，使他對詩有著一種超人的執著精神，「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簡直是視詩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僅使詩的題材和體裁範圍空前擴大，達到了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詩歌藝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極的境地。故被尊為「詩聖」。杜甫對中國詩歌的貢獻，不僅僅是「集大成」而已，更重要的，是對詩歌的創新，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是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創新。詩到杜甫為一大變。杜甫詩歌不僅表明中國詩歌史從浪漫轉向寫實的重大變化，而且以更加內在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以及士人社會地位的調整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與時代文化精神的重大變化，以及隨之而來審美範型的重大轉變。清人陳廷焯說得好：「詩至杜陵而聖，亦詩至杜陵而變。……昔人謂杜陵為詩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論。」（《白雨齋詞話》卷七）「與古為化，化而能新」，可以概括杜甫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貢獻。宋初王禹偁《日長簡仲咸》詩云：「子美集開詩世界。」這是對杜甫詩歌價值判斷的一次昇華，在杜詩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就詩歌演進的歷程而言，杜甫的所謂「開詩世界」，就是肇示了詩歌由「唐韻」向「宋調」的轉變。所以說，杜甫又是處在中國歷史轉折時期的一位繼往開來的偉大詩人。清人葉燮說：「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異，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原詩·內篇上》）應該特別提到的，是在文學批評史上，杜甫首開以詩的形式論述詩歌創作的先河。他在《戲為六絕句》中提出若干詩歌創作的主張，如主張對前代詩歌藝術兼收並蓄，博採眾長，對六朝詩歌一分為二，拒絕全盤否定，從而糾正了王勃、楊炯以及陳子昂、李白等人在矯枉中出現的偏頗。杜甫又提倡「凌雲健筆」、「碧海掣鯨」的詩風，同時，他還強調學習前人的「清詞麗句」，這對於建構唐代詩學都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戲為六絕句》，

他還有〈偶題〉、〈解悶十二首〉、〈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等，也談到了詩歌創作的主張。這種以詩論詩的新形式，對後人影響很大，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就是繼承的這種形式，後代人用這種形式論詩的，更是代不乏人。

杜詩眾體皆有，諸體兼擅，諸法俱備，為後世開無數法門。據浦起龍《讀杜心解》統計，杜詩共一千四百五十八首，其中五古二百六十三首，如〈望嶽〉、〈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佳人〉、〈夢李白二首〉、〈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七古一百四十一首，如〈兵車行〉、〈麗人行〉、〈丹青引〉、〈古柏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五律六百三十首，如〈房兵曹胡馬〉、〈畫鷹〉、〈夜宴左氏莊〉、〈春望〉、〈月夜〉、〈月夜憶舍弟〉、〈天末懷李白〉、〈春夜喜雨〉、〈旅夜書懷〉、〈登岳陽樓〉等；七律一百五十一首，如〈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閣夜〉、〈宿府〉、〈又呈吳郎〉、〈登高〉等；五排一百二十七首，如〈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等；七排八首，如〈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五絕三十一首，如〈八陣圖〉等；七絕一百零七首，如〈贈李白〉、〈贈花卿〉、〈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等。杜詩不僅名篇眾多，而且富於創造，成為流傳千古的藝術瑰寶。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向被譽為「古今絕唱」。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更是杜甫開創的一種新的詩歌體式，為中唐以後的新樂府樹立了榜樣。清王士禛認為「七言古詩，諸公一調。唯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居易錄》卷二一）把杜甫的七言古詩奉為「千古標準」。律詩，特別是七律，更是成熟於杜甫。清錢良擇《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云：「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為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明胡應麟就把他的〈登高〉奉為「古今七言律第一」。杜甫又是

拗體七律的創始者，如〈白帝城最高樓〉、〈白帝〉等。他到夔州後寫的一些長篇排律和聯章詩，如〈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秋興八首〉等，以它獨特的風貌，標誌著他對這些詩體的創造、運用已達到全新境界。可以說，夔州時期，杜甫的詩藝已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地。杜詩，特別是律詩，可以說是從容於法度之中，而又變化於法度之外。他於法度中求變化，縱橫變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達到完美的統一。杜詩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所呈現出的主體風格是「沉鬱頓挫」。所謂「沉鬱頓挫」，是指杜詩內容上的博大精深，憂憤鬱勃；形式上的波瀾老成，頓挫變化；語言上的精煉準確，含蓄蘊藉。從而形成了千壘萬狀、地負海涵、博大宏遠、真氣淋漓的美學風貌。

杜甫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的詩歌創作藝術的超前性、現代性和世界性。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斯蒂芬·歐文）說的那樣：「杜甫是最偉大的中國詩人。他的偉大基於一千多年來讀者的一致公認，以及中國和西方文學標準的罕見巧合。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杜甫幾乎超越了評判，因為正像莎士比亞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他的文學成就本身已成為文學標準的歷史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杜甫的偉大特質在於超出了文學史的有限範圍。」（《盛唐詩》第十一章〈杜甫〉）

四、杜甫的影響和歷代研究情況

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杜甫之後的一千多年，中國詩壇上的傑出詩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受他影響的。唐代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韓愈、孟郊、賈島、李賀、李商隱、杜牧、皮日休、陸龜蒙、韓偓、韋莊等；宋代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辛棄疾、文天祥等；金代元好問等；明代袁凱、李夢陽、鄭善夫、陳子龍等；清代錢謙益等，無不推尊杜甫，學習杜甫。杜甫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詩歌，